



王栋：不畏艰险身先士卒的革命英雄



王栋。(资料图片)

王栋，原名王澄宇，又名王撑宇，宁夏中宁人，1914年出生于薛营村一个富裕家庭，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栋自幼熟读私塾，1933年由中宁县恩和高小毕业。1934年夏，王栋的父亲到天津经商，20岁的王栋随同到北平上学，由当时在北平从事地下活动的表兄张子华

介绍考入北平文治中学。张子华工作之余常和王栋攀谈，又介绍他阅读一些进步书刊。王栋从平时与张子华的谈话和书刊中了解到苏联的一些情况，对旧中国的黑暗和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逐渐有了认识，开始向往革命并对共产党产生了敬仰之情。9月的一天，张子华突然匆忙地来到王栋住处，对他说：“表弟，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有公事要去河南。今后，诸事都要小心，谨言慎行，多加珍重！”说罢就转身离开了。几天后，国民党特务突击搜查了张子华住处。一天，王栋所住的公寓忽然闯进两个特务，将正在吃午饭的王栋抓到北平市第五区公安局，并逼问他张子华的去向。王栋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一口咬定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无论特务采用什么手段逼问，王栋始终回答不知道，特务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将王栋关押了七八天后释放。

1936年5月，王栋的父亲从宁夏到天津，写信叫王栋去天津相见。王栋便请假来到天津，两人见面后，父亲认为当时平津地区社会秩序混乱，日本浪人横行，坦克呼

啸街市，在北平上学太危险，让他停学回家。出于对革命的向往，王栋不愿中途辍学，经再三请求，他又返回北平，在其友袁家节家补习英文和代数。

1937年春，王栋转入北平铁路学院附属东方中学上高中。当时，平津市民抗日情绪高涨。5月，北平高中学生齐集西苑进行军事训练，后因七七事变，平津沦陷，王栋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流亡青岛。通过流亡同学会的帮助，经徐州、郑州，来到西安。到西安后，王栋立即四处打听张子华的消息，最后从八路军办事处得知张子华已调回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王栋立即给张子华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希望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学习和工作的愿望，请八路军办事处转达。在等待张子华回信期间，王栋因长时间离家，十分思念母亲，于1937年底回到家乡中宁。不久，便收到了张子华的回信，张子华在信中表示欢迎王栋来延安。王栋欣喜若狂，立即向父母、妻子辞行，邀约好友于1938年4月一起奔赴延安。到延安后，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王栋来到陕西洛川，被编入设在那里

的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学习，化名雷鸣。同年10月，王栋被调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政工队学习，12月由周玉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4月学习结束，组织上拟分配王栋到陕北一个县当政府秘书，但他强烈要求上前线。同年6月，王栋被分配到内蒙古大青山骑兵支队工作。在此期间，王栋先后任三团侦察员、一连副连长、游击队长、十一连代理连长、政治指导员等职务。他善于团结同志，吃苦耐劳，作战勇敢，经受了抗日战争的严峻考验。1943年1月，王栋被调到山西偏关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参加整风。整风结束后，王栋被分配到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警卫连任政治指导员，1946年任营长，后又升任副团长，转战陕北，参加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

1947年10月，在清涧战役中，王栋不畏艰险，身先士卒，深入前沿阵地，不幸牺牲，时年33岁。

1952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追认王栋为革命烈士。

(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发展

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至1950年之间，在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的东部，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第二次国共内战起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新中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建制于1950年1月改称为西北军政委员会。

陕甘宁边区为了保证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抗日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出发，专门制定了适合边区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 and 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同舟共济，艰苦奋斗，于是，边区工业，蓬勃发展，边区面貌，焕然一新。

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接管了延长油矿。在延长正式设立了石油厂，先后设立工务、总务、会计、材料四科。开始迅速开展恢复边区石油生产的工作，到年底共投资10574元，对个别油井进行了细心清理修复，并准备新建4号油井。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破坏，油矿打井和炼制原油的机器设备遭到敌人破坏，一些机器零件散失于民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石油厂协同当地政府“召集群众大会，动员群众，把在红军撤离时失散的机器零件，向乡、区、县政府报告或送回油厂，政府分别给以奖励。因延川是老苏区，群众都有组织，在大会上，好多群众自动报告，将机器送回油厂。”

为促进恢复和发展石油的生产，边区贸易局也为石油厂从西安等地购进了一批机器零件。经过边区石油工人一年多时间的辛勤努力，一些旧有的油井开始出油，新打的一口油井也开始出油，不仅很快地恢复了石油生产，而且原油的产量也有所增加。到1938年时，边区生产原油3527桶（每桶12.5公斤），炼制汽油167桶、特甲油1381桶、白蜡油856桶，这标志着边区石油工业的正式建立。陕甘宁边区的石油是边区重要的工业能源和抗战物资，也是边区自给工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产业。由于对石油及其产品的迫切需求，就使边区政府对石油的生产极为重视。早在1937年5月，在边区政府成立的筹备工作中，后来担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就提出了“在工业上注意发展石油、盐、煤、铁等主要生产”的边区工业建设任务。1938年，为了保障抗战军需公用的供给，延长石油厂移交由中央军委后勤部管理，任命陈振夏

为石油厂厂长。石油厂最初实行供给制。后来进行了体制改革，“由供给为主，改为企业为主供给为辅的国家企业公司性质。”这样基本上实行国家企业化管理。在行政上设生产管理科、经营管理科；在生产部门设有打油部、抽油部、炼油部、修理部等；并建立和规范了相应的各项管理制度，全体职工均实行集体合同制。

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把“加强对石油、煤矿的管理，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作为陕甘宁边区工业经济建设中的主要任务之一。

1941年1月，边区政府在经济建设计划中提出：“扩大石油的产量，最低限度应比去年提高3倍”的计划和要求。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论述边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时指出：“在发展边区的工业经济建设中，要把‘增加煤油出产，保障煤油自给，并争取一部分出口，作为边区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石油生产予以高度重视，不仅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投资石油生产，在每年的边区经济建设计划中都对石油做出了生产计划和要求，而且在生产物资和粮食供给上也给予照顾，以保障边区石油的生产。边区贸易局多次派人到西安等地，为石油厂购买生产机器设备及零件工具等，边区政府还指示当地政府为石油厂代购粮食等。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开始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禁止一切工业品、生活日用品、工业生产材料及工具等进入边区。为克服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造成的边区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边区抗日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以发展边区的自给经济，坚持持久的抗战。在这种情况下，边区对于石油的生产及其产品的需求更为突出，发展边区的石油工业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抗战需要大量的武器装备、枪支弹药，发展兵工企业是陕甘宁边区的头等大事。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整合陕北红军分散的兵工厂、修械所，组建中央红军兵工厂。中央红军兵工厂随部队先后驻扎清涧、延川、吴起、延安、延长等地，之后回迁到延安柳树店。抗战爆发后，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及抗战形势的需要，1938年3月正式成立了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统一管理边区军事工业。不久，军工局划归中央军委后勤部领导。1942年5月改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领导。军工局成立后，首先将中央红军兵工厂由延安柳树店迁到安塞县茶坊镇，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按照军工局确定的“先设备，后步枪”的生产方



如火如荼的陕甘宁边区生产合作社。

针，从1939年起按照生产作业性质，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分拆、整合，先后组建军工局一厂、二厂、三厂、五厂、六厂、八厂、紫芳沟化学厂等军工工厂。1938年5月，创建成立了延安通信材料厂。1942年，组建八路军留守兵团第一兵工厂。1940年至1944年，在八路军晋绥抗日前线的大后方，晋绥军区工业部一厂、二厂、四厂等兵工厂先后在陕甘宁边区佳县组建投产。

经过几年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兵工企业初步形成机器制造、子弹复装、枪械修造、火炸药制造、手榴弹及掷弹筒制造、通信设备生产等较为完整的武器装备生产体系。在大生产运动中，军工局还先后创办了陶瓷厂、玻璃厂、焦炭厂、水力发电厂、炼铁部等为兵工服务的工厂。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呈现出蓬勃发展局面。

三

抗战爆发后，在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发展工业经济方针的指引下，延安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工厂、农具工厂、制革工厂、制鞋厂、石油厂以及八路军制药厂等综合工业。

这些工厂后来大都起到了边区军民抗战和生活的主要实用性作用。1938年以前，边区的布匹完全依赖从外边输入。而难民纺织厂创办以后，这种情况截然改变，产品服务于边区军民。难民纺织厂开始在安塞县二区高桥镇，以后迁到延安县西川口。这个工厂从开始8台机器和10个工人，到1938年底，发展到45名工人，4台织布机，2台纺毛机，2台毛巾机，5台袜子机，1台弹花机。1942年年底，职工总数扩大到370多人，房间120间，窑洞210孔，可容千人的大礼堂一座。机器装备也有很大扩充，已有铁机38台，木机18台，合股机7台，整经机4台，络纱车100多台，还有车床、钻床、旋床和发动机等。

边区的纺织工业是发展最快的工业。到1948年，边区的公营纺织工厂已发展到20多家，职工1300多人，产量3000多匹，可供给部队、机关、

学校人员所需要量的70%。发展到1944年，边区就有120多个公营工厂，其中，边区政府系统15个厂，军工系统8个厂，中央管理系统16个厂，联防司令部系统12个厂，各地驻军有35个厂，各地专署有9个厂，各县政府有8个厂，其他单位的有20个厂；边区的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到1.2万余人。

军事工业，军工局一厂（机器厂）几年中，为二厂（造枪厂）和无烟火药厂制造了机器设备，供给了前方（主要是一二〇师）部分机器及延安各厂的部分机器。二厂供给了边区内部队枪支的补充。三厂是化工厂，是由钱志道同志一手筹建和领导生产的，主要是制造无烟炸药、各种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等。二厂与一厂合并后，一年供给了保卫边区的部队所用的手榴弹、迫击炮弹掷弹筒及每月十余万发子弹，还供给前方火药和白药，供应各个根据地所需的无烟火药。留守兵团的兵工厂，1942年以前，每月生产手榴弹五六千枚，1943年提高到月产10万枚。延长石油厂和永坪分厂，百分之百的保证了无线电台、各种机器工厂和一部分汽车和灯用所需的石油。民用工业方面，如纸张、印刷、油墨、肥皂、毛毯、毛巾、鞋袜、食油、食盐等，都保证100%的供应。

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取得“为抗战服务、保障军民供应”成就的原因在于：陕甘宁边区能坚决执行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正确方针。1939年，边区经济开始被封锁，工业产品输入受到了限制。当时，边区的建设客观上是工业没有基础，加上外援断绝，需要白手起家。主观上，当时缺少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急需选拔和培训。为了抗日战场和建设边区的需要，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号召。边区军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建立了边区自己的公营经济，并且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农副业生产，终于渡过了难关。

(据《民主协商报》)

1922年5月上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举行，中国青年团组织正式诞生，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共青团）。在共青团百年历史中，全民族抗战时期是一个特殊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将共青团改造为非党的青年组织——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青救会）。西北青救会作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青年运动的最高领导机关，团结全国广大青年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年4月15日，毛泽东为西北青救会成立一周年题词：“青年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目前青年团体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一切阶层的青年男女，大批地走向抗日战争的战场去，充实正规军的战斗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后方的青年人，也是一切为着战争胜利而工作。中国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10月2日至7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

安吴青训班被誉为“青运史上的丰碑 抗日青年的熔炉”

为加强青年干部的培养，1937年10月，经中央批准，西北青救会在陕西三原头口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农场创办了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冯文彬任主任，胡乔木为副主任。

1937年12月，当得知青训班缺少教员时，毛泽东立即指示中央有关方面在干部力量和经济方面给予支持。中央组织部从抗大、中央党校等地方抽调了一批骨干力量，如黄春霖、李东潮、刘瑞龙等前往青训班，大大增强了青训班的教学力量。青训班敞开大门，不仅大批接收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来的爱国青年，还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刊登了招生简章。

1938年初，因青训班学员人数增长过快，云阳镇无法容纳，校址便迁往安吴堡，所以又称“安吴青训班”。安吴堡这个陕西泾阳北部的小村庄，一下子成为全国各地热血青年的向往之地。他们冲破道道关卡，接踵而至，云集安吴堡。1939年10月5日，毛泽东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朱德接受邀请担任安吴青训班名誉主任，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博古、谢觉哉、彭德怀、贺龙等中央党政军领导人，都给予了安吴青训班很高的评价和亲切的关怀。青训班正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从第四期起进入大规模的发展阶段。

在青训班受训的青年干部，尽管出身不同、信仰各异，但他们在这里接受的是革命人生观和抗战建国本领的培训，进而成为具有民族觉悟、抗日军政知识、拥护共产党领导和国共合作的抗日战士。在国民党反共愈加严重的形势下，1940年4月，青训班奉令撤回延安。之后，青训班全体学员进入“泽东青年校”继续学习。

安吴青训班从创办到撤离共两年半时间，办了14期，培训1.2万多名学员。为前线、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友军、爱国青年团体等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为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作出了贡献，被誉为“青运史上的丰碑，抗日青年的熔炉”，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广泛宣传动员 为抗日前线输送生力军

为唤起民众奋起抗战，西北青救会发挥各级青救会组织在战时宣传、教育中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宣传发动。他们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分队等联合创办旬刊《青年战线》，介绍青年运动，讨论青年生活发生的各种问题，介绍抗战形势，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成为鼓舞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号角；1939年4月，青救会在延安出版《中国青年》杂志，指导全国青年运动，交流救亡经验，还编印各种通俗书籍和小册子，扩大抗战宣传；成立抗战剧团，创作排练《亡国恨》《打回老家去》等抗战剧目，深入到陕西、甘肃、河南等省的工厂、农村、学校、部队进行演出；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充分利用各种识字班、识字牌、夜校、墙报、读报组、训练班、救亡室、歌咏队等，结合文化普及教育传播救亡思想。

西北青救会积极动员广大青年踊跃加入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队伍，在1939年以前，共动员8000多人参加主力部队。1941年，为响应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号召，在边区各级青救会的动员和干部带头下，广大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八路军，到7月底就有1598名青年入伍，奔赴抗日前线。为了积极配合抗战，陕甘宁边区青救会组织14岁至18岁的少年成立少年先锋队，组织18岁以上的青壮年成立青年自卫军。从1937年11月到1939年11月这两年间，边区青救会不断地为自卫军培养优秀合格的青少年人才，总数达到2.38万人之多。陕甘宁边区青救会组织青年自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侦察搜集敌情、破坏敌人交通、协助我军医疗等活动，配合并服务于战事，保卫边区，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参与经济文化建设 促进边区发展

由于日本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边区供给出现困难。1940年12月2日，边区青救会召开各县青救会经济干部会议，决定成立边区青救会经济部，县、区青救会设经济科，统一组织和领导青年参加边区的经济建设。青救会将创建青年农场作为青年投入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边区青救会在延安等11个直属县试建青年农场取得成功后，随即出现青年合作社、青年变工队、青年运输队等，在陕甘宁边区农场中普遍推广，调动了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上也收到良好的效益。如延川县青救会在1942年上半年带领青年开荒3万亩，建立变工队、扎工队128个，帮助655名青年订立了家庭生产计划。

西北青救会协助边区政府创办青年钢铁厂、青年纺织厂、青年造纸厂，开办青年技术学校，培养技术工人，积极钻研推广先进生产技术。许多青救会会员带动青年家庭发展家庭手工业，组织青年工人制造生活用品。边区的纺织业、印刷业、农具制造业等轻工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到1941年，纸张自给率达到了50%，纺织自给率达到了60%，开采的食盐也可以大量外销出境。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广大青年争当劳动模范、生产能手，积极生产，成为经济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青救会是抗战时期各种抗日青年组织的总形式，为共青团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共青团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北京日报》)

青救会：陕甘宁边区的生力军